

回望淮南淮河文化中的抗洪担当(上)

徐瑞成

淮河，古称“淮水”，是淮南的母亲河。淮南地处淮河中游，是淮河流域防洪的关键节点。千百年来，淮河洪水频发，“大雨大灾、小雨小灾”的困境，锻造出淮南人民独特的抗洪担当。这种精神植根于淮河文化沃土，融合了历史积淀、实践淬炼与时代传承，是淮南人民不屈意志、奉献情怀与智慧担当的集中体现。

深厚的根魂:抗洪精神的历史积淀

《诗经》中记载，“淮水汤汤，忧心且伤”。淮南与淮河相依相生，独特的治水史贯穿城市发展全程。从先秦治水探索到近代抗洪斗争，千年岁月中，抗洪精神逐渐融入淮河文化血脉，成为淮南人民的精神基因，彰显着敬畏自然、主动抗争、坚守家园的精神底色。

(一)先贤治水奠基，铸就抗洪根脉。淮南治水历史可追溯至先秦，孙叔敖是淮河治水的标志性人物。春秋时期，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芍陂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塘”。芍陂位于寿县境内，引淝水入塘，灌溉农田万顷，兼具防洪、灌溉、航运功能，历经 2600 余年仍发挥作用。孙叔敖“因势利导、顺势而为”的治水理念，打破了“水患不可治”的神话，奠定淮南人“主动治水、科学防洪”的思想根基。汉代至唐宋，淮南治水持续推进。汉代加固淮河干堤；唐代疏浚淮河支流，完善农田水利；宋代因黄河夺淮，淮南水患加剧，官府与民众合力筑堤、疏浚河道，在正阳关、凤台等地修建了防洪设施。寿县古城始建于宋代，西瓮门北向、北瓮门西向，形成涡流防洪结构。1991 年淮河发洪水时，寿县古城外洪水水位最高达 24.46 米，坚固的防洪体系守护了城内 10 万群众安全。千年治水实践，让“不畏水患、坚守家园”的信念深深扎根，为抗洪精神注入厚重历

史底蕴。

(二)近代洪灾磨砺，凝聚抗争意志。近代淮河洪水频仍，给淮南带来毁灭性灾难。1931 年淮河大水，淮南境内淮北大堤多处决口，凤台、寿县、田家庵等地一片汪洋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1938 年，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，黄水泛滥淮河近 9 年，淮南水利设施尽毁，淮南大地陷入“大水大淹，小水小淹，低洼地岁岁受灾”的绝境。1950 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，淮南两岸地区淹没耕地约 6 万亩，村庄 70 余座，倒塌房屋约 9000 多间，但群众组成抢险队，展现出“灾难压不垮、洪水冲不散”的坚韧意志。民国时期，虽战乱频繁、国力衰弱，淮南人民在灾难面前从未屈服，形成“众志成城、顽强抗争”的精神特质。1931 年洪水时，《凤台县志》记载，凤台县群众自发组织抗洪队伍，用土袋、木桩加固河堤，数百群众连续奋战，用身体阻挡洪水冲击。近代百年洪灾磨砺，让抗洪担当从历史基因转化为淮南人民的集体意志，融入淮河文化的核心内涵。

(三)文化浸润滋养，塑造精神内核。淮河文化是抗洪精神的滋养土壤，淮南作为淮河文化的核心区，独特的地理环境、生产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，塑造了抗洪担当的核心内核。淮河中游“两头高、中间低”的地形，使淮南成为洪水走廊，频发的水患让“居安思危、防患未然”成为淮南人的生存智慧。沿淮民众世代以农耕、航运为生，对淮河既敬畏又依赖，形成“人水共生、和谐共处”的理念。抗洪不是征服自然，而是顺应规律、守护家园。民俗文化中处处可见抗洪担当的印记。寿县“抬阁抬阁”民俗，源于古代祭祀河神、祈求安澜的仪式，传承至今，体现民众对淮河的敬畏与守护。淮河文化中“重义轻利、团结互助”的价值观，让抗洪成为全民共识。历史上，每次洪水来临，不分宗族、贫富和

男女，民众都自发互助，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共同抵御洪水。这种文化浸润，让抗洪精神超越单纯的抗灾意识，升华为“守望相助、无私奉献”的人文精神，成为淮河文化的重要标识。

无私的担当:抗洪精神的实践淬炼

新中国成立后，淮河治理进入新阶段，毛泽东主席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，激励淮南人民投身治淮与抗洪实践。从 1954 年特大洪水到 2020 年淮河 1 号洪水，历经数次严峻考验，淮南人民用行动诠释抗洪担当，在抢险救灾、工程建设、重建家园中，淬炼出“顾全大局、不畏艰险、科学抗洪”的精神特质。

(一)危难时刻挺在前，彰显无畏勇气。淮南境内淮北大堤总长 66.72 公里，占全省淮北大堤总长度的 10.6%，是淮河防洪的“咽喉要道”。1954 年，淮河流域发生 40 年一遇特大洪水，淮南段正阳关水位超历史最高纪录，淮北大堤多处出现管涌、裂缝。凤台黑龙潭作为淮河流域的重点险段，水急浪高，堤防承受着巨大压力。在那个缺乏重型机械的年代，当地军民为了守住大堤，在堤坝上风餐露宿、挑土加堤，经历了长达一两个月的持久战，最终配合全局战胜了这场特大洪水。1991 年淮南遭遇特大暴雨，瓦埠湖漫堤，寿县古城被洪水围困。淮南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，组织数千干群奔赴防汛一线，用石块和土袋封堵城门，严防洪水入城。2020 年 7 月，潘集区高皇镇淮上村因地势低洼被洪水淹没，民兵应急分队驾驶冲锋舟，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连续搜救 12 小时，转移群众 2000 余人，无一人伤亡。危难时刻，淮南人民“不畏艰险、挺身而出”，用勇气与坚守筑起抗洪“铜墙铁壁”。

(二)舍家为国顾大局，诠释奉献精神。淮南是淮河蓄洪、行洪的重要区域，

为保障淮河干流及下游安全，沿淮群众多次舍小家、顾大家，主动承担蓄洪损失，用无私奉献诠释“上保河南、下保江苏”的抗洪担当。王家坝闸虽位于阜南，但紧邻淮南凤台，是淮河防汛“风向标”，自 1953 年建成以来，13 个年份 16 次开闸蓄洪，每次蓄洪都直接影响淮南沿淮群众。1991 年抗洪，淮南实施行蓄洪 25 处，滞蓄洪水 70 多亿立方米，沿淮群众主动放弃家园，紧急转移，做到“保大堤、保煤矿、保电厂、保铁路、保生命”。2020 年 7 月，淮河发生 1 号洪水，王家坝最高水位达 29.76 米，创下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 2 高位。面对危急局势，蒙洼蓄洪区开闸蓄洪，淮南凤台县沿淮群众主动撤离家园，但群众毫无怨言、坦言“为了淮河安澜，牺牲值得”。这种“舍小家为大家、舍局部保全局”的奉献精神，是淮南抗洪精神的核心，也是淮河文化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。

(三)科学治水强根基，集聚智慧力量。抗洪精神不仅是勇气与奉献，更是智慧与科学。淮南人民坚持“尊重规律、综合防治”策略，在抗洪实践中总结经验、创新方法，推动抗洪从“人力抢险”向“科学防控”转变。1950 年起，淮南大规模开展治淮工程建设，先后加固淮北大堤、修缮寿县古城防洪体系，整治淮河支流、建设排涝泵站，构建“堤、库、闸、站”一体化防洪工程体系。在抗洪抢险中，淮南运用水文监测系统、无人机巡查、远程视频会议等技术，实时监控水情、工情，精准调度防洪资源。针对管涌、裂缝等险情，采用“反滤围井”“土工布防渗”等专业技术，提高抢险效率与安全性。应对 2020 年 1 号洪水中，谢家集、寿县、凤台等地采用科学办法实现“人员伤亡、堤防零溃决”的目标。从“肩扛手抬”到“科技赋能”，从“被动抢险”到“主动防控”，科学治水让抗洪精神更具时代内涵，彰显淮南人民“尊重规律、善作善成”的智慧担当。

文物“淮南”在“兵戎相见”中诞生

周 强 杨 倩

典故淮南历史第一季

文献“中国”诞生于周厉王时期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中的诗句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”，而文物“中国”则诞生于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“宅兹中国”，比文献“中国”诞生要早两百多年。同样，文物“淮南”诞生也要比文献“淮南”早四百年左右。两相对照，既可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，亦反映出淮河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异曲同工之妙。

“兵戎”就是武器。成语“兵戎相见”就是以武力相见，用战争解决问题。根据出土青铜器铭文，文物“淮南”的诞生就是“兵戎相见”的结果。2020 年 6 月 9 日，平顶山晚报发表的《应国风云：兵戎相见的战争阴云》(作者尹家祥)说，“在西周中晚期，至少有两处征伐南淮夷的战争与应国国君有关。第一次战争的统帅正是第五代应侯见工”，应侯见工鼎铭文记载的出征经过是，“见工奉周王命令率领军队征伐南淮夷毛、袁等部族，俘获很多铜戈”。应侯见工簋盖铭文则称，应侯见工率师“伐毛取得完胜，伐袁俘获很多铜戈”。

应国封地原在山西应县，商代即已存在。西周初封给周武王之子，成为侯爵诸侯，后来又改封至河南鲁山县一带。因为始封之君是“武之穆”，故而政治地位相对较高，并且还肩负负拒南淮夷、南控楚蛮的重要职责，成为保障西周王室南方安全的强藩。

鲁山县归属平顶山市，应国国君死后，一般都安葬在平顶山市湛阳镇的应国贵族墓地中。20 世纪末，应国墓地发生多起盗掘事件，多件应侯见工铜器频频出现于海外文物拍卖市场，并被国内一些博物馆以重金收藏。在传世的 10 余件西周中期应国有铭铜器中，绝大多数作器者是应侯见工，已知的应侯见工铜器共有 8 件，上海博物馆收藏应侯见工鼎 1 件，美籍华人收藏应侯见工簋 1 件，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应侯见工簋 2 件与应侯见工钟 2 件，陕西蓝田县博物

寿州锣鼓

赵 阳

淮水汤汤，载千年烟波东流；八公巍巍，携万古传说矗立。楚都故地，淮南寿春，一城浸古韵，满目皆风华。在这片淮水滋养、楚风濡染的土地上，寿州锣鼓是跃动千年的文化脉息，携上古清音，承楚风淮韵，穿越岁月尘烟，回荡于淝水之滨。它敲响山河沉寂，温润市井烟火，成为沿淮大地最雄浑婉转、动人心魄的非遗绝响。

寿州锣鼓的文脉，深植于华夏鼓乐文明的厚土，沉淀于千年时光的淬炼。数千年前，先民琢骨为器、制匏为鼓，奏响上古律律先声。殷商甲骨之上，数十种“鼓”字镌刻着远古礼乐密码。汉铸铜锣清越，魏晋铜钹和鸣，层层铺展成中华鼓乐的浩瀚长卷。《诗经》记载：“鼓钟将将，淮水汤汤。”千古吟咏早结绡了淮水与鼓乐的千年情缘，让击乐和鸣、踏歌而行，成为淮河两岸先民根植血脉的诗意日常。

细究起来，其风骨气韵，终源于璀璨楚韵。战国末年，楚考烈王东徙寿春，荆楚礼乐文明于此落地生根、蔚然成风。《楚辞·招魂》所记“陈钟按鼓，造新歌声”，正是当年寿春乐舞升平、钟鼓和鸣的鲜活图景。彼时楚宫乐制完备，悬鼓、手鼓、木鹿鼓品类纷呈，锣鼓之声回荡于宫廷宴乐、社稷祭祀、军旅陈前与市井庆典，浸透世间烟火百态。楚地先民尚艺善歌、风雅天成的气韵，代代承袭、绵绵不绝，终经岁月淘洗，褪去古制繁冗，吸纳南北灵气，凝练成刚柔相济、独步江淮的艺术瑰宝——寿州锣鼓。

每当华灯初上，寿州古城南门外的春申广场上，以及北门城门洞内、东门内广场，都有一支支锣鼓表演队在倾情表演。驻足观看细品，我发现，寿州锣鼓兼容南北鼓乐之所长，兼具江南锣鼓的舒缓清婉、灵动雅致，又蕴藏着中原锣鼓的雄浑苍劲与慷慨豪放。一鼓一钹，起落之间，是淮水的温润从容，亦是楚地的疏朗豪迈。世人誉其为“会说话的锣鼓”，声声抑扬顿挫的节律，娓娓道尽乡土岁月的沧桑和人间烟火的悲喜，其言不虚。

器物之纯粹，成就其韵之灵动。寿州锣鼓乐制简约清雅，大筛锣、腰鼓、大小铜钹错落排布、相得益彰，而作为基调“统帅”的钢锣，是整首鼓韵的灵魂所在。此锣质厚形朴，迥异于寻常铜器，敲击之际如空谷鸣铎，清越穿云、悠远绵

馆收藏应侯见工钟 1 件，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应侯见工钟 1 件。“淮南”一词出现在美籍华人收藏的应侯见工簋盖铭文中。

应侯见工簋于本世纪初面世，簋盖内壁铸铭文 9 行 82 字。根据专家释读，铭文大意是：在某年正月初吉丁亥这一天，王这样说：“应侯见工，伐淮南夷毛！（因为他们）竟敢武装民众，大肆兴兵，大举侵犯我南部地区。”王命应侯见工征伐淮南夷，结果取得完胜；剿伐南夷衰，俘获大量铜戈。我不敢忘记这件事情，故用这些铜料制作铜簋，用来送给我的姑舅单姬，愿她用以求求长寿，其子孙后代永远珍爱地用进行祭祀。

“淮南”在铭文中出现两次。前者原文是：“应侯见工，伐淮南尸毛”；后者原文是：“王命应侯正伐淮南尸毛”。“尸”通“夷”，“毛”通“苗”，“正”通“征”，可见应侯见工奉周王之命征伐的对象是淮南夷中一个叫“毛”或“苗”的部落。综合文献记载和铜器风格，《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》(作者王龙正、刘晓红、曹国朋)认为，“应侯见工所铸铜器群，如编钟、鼎、簋盖，簋的年代，彼此之间相差时间均不宜太长，故以断属孝王，夷王时期较为适当”。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确定的周孝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891—前 886 年，周夷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885—前 878 年，就是说，因“兵戎相见”而诞生的文物“淮南”其诞生年代约在公元前 891—前 878 年之间。

应侯见工鼎铭文中出现的“南淮夷”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频频出现。学界认为，山东半岛流入渤海的新河古称淮水，又称淮水，分布在淮水流域的东夷族群是最早的淮夷。商周易代，部分淮夷部落南迁至现在的淮河流域，称南淮夷，新居地河流亦被命名为淮河，而留居淮水故地的部落则仍称淮夷。而应侯见工簋盖铭文出现的“淮南夷”则是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，这比《晏子春秋》“橘生淮南则为橘”的文献“淮南”诞生要早三百年左右。

根据专家释读，应侯见工簋中的两个“淮南夷”表义与南淮夷相同。笔者以为，南淮夷可以理解为淮河两岸之夷，淮南夷则只能理解为淮河以南之夷。



怒涛奔涌

方守安摄

红风戏院的点滴往事

高振中

田家庵老北头趣闻轶事

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批准建立淮南市，促进了五湖四海人们的汇聚。一座新兴的年轻城市，能源大开发、经济大建设也带来了文化大发展，淮南最早的具有新中国新面貌的大戏院——红风戏院应运而生。

1951 年 5 月，为了满足市民及矿业工人的文化生活，市政府在拆除原民国“三义舞台”砖木老戏馆的原址上，投资新建约 500—600 座席的红风大戏院。戏院的建筑外貌，既有苏式建筑的风韵，更有民族风格的特色，是一座中外合璧、符合时代审美的大型剧场，也是淮南重大的市政文化设施。

戏院落成后不断邀请京剧名家、省内外剧团到此巡演折子戏、全本戏。据《淮南市志》记载，1955 年三、四月间，严凤英率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红风大戏院连续演出 72 场，有时一天还要演出 2 场，观众达 7 万 3 千多人，平均每天有一千多人在此集聚。

正值青壮年的戏院经理姚先生，组织创作排演贴近矿工与市民生活、

反映矿山建设、农业合作化、大跃进等主题的现代小戏、活报剧。还编辑《红叶诗刊》《新芽诗刊》，因资金困难是粗纸油印本，却活跃了淮南文化氛围，培养了一代文艺人才。

戏院建筑是物质形式，演出节目是精神佳肴。那时戏院内外一片生机盎然，演员观众共享温暖春天。但社会发展、变革浪潮，则演绎了戏院内外的风云变幻。

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，是母亲单位包场带我进入剧场，剧场内只有能坐 3—4 个人的长条椅子。我 3.4 岁时朦朦胧胧，看见戏台上满面油彩的大花脸，吓得哇哇大哭，一头扎进了母亲的怀里。母亲只好抱着我中途退场，放弃她喜爱的外地京剧名家的演出。

那时，红风戏院是田家庵老北头的文艺中心，那时提倡百花齐放，各种故事片、戏曲片纷至沓来。亲友从外地来，请他们一起看一场戏，或看电影、文艺表演，都是待客之道。而一家人一起进戏院，那是这个家庭难得的盛大活动。观赏后的一段日子里，剧情戏码还晕染在每个人的心中，话里话外总念叨着人物的命运与喜怒哀乐。这也是文学艺术对我的启蒙。

60 年代初，我第一次到红风戏院参加文艺汇演。那个年代虽然生活困难，但学校文艺活动依然热闹，老师携

足了劲指导，学生铆足了劲歌唱。戏院内外激情澎湃，老北头有了那个时期难得的温馨时光。

1965 年前后，《列宁在十月》《列宁在 1918》是难能可贵的外国电影。大家刚经过粮食紧张的困境，与电影反映的苏联经济困难非常相似。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与妻子娜塔莎的对话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仿佛是我们生活的写照，因而引起大家的共鸣，成为社会上全民流行语。我们在校园里一边啃着芋头、胡萝卜，一边重复着这些台词，笑声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难。

我读四年级时，有一次到戏院观看纪录片。观影的学生个个激情澎湃。电影结束后，我看到戏院前厅的留言簿，就写了观后感。没过几天，有同学告诉我，你写的观后感在戏院宣传栏展览了。这篇观后感也是我的文章第一次“露脸登场”，对我热爱写作起到了阳光、雨露般的作用，让我少年的人生土壤不再贫瘠和荒凉。成就感是人的引擎，这是我对戏院最深刻的回忆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戏院的功能由演戏转变为放电影，那时电影只有“三战”：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还有《平原游击队》和样板戏电影。我们一些十多岁的孩子，像一排排燕子蹲在电线上一样，蹲在戏院的围墙上，翻墙

头进入戏院，乌泱泱地挤在走道里，不厌其烦地观看烂熟于心的电影，与银幕上的人物抢着说台词。上学的课文我们记不清楚，电影里的对话，我们个个耳熟能详。

1982 年我考上电视大学，戏院经理姚先生已近退休，聘请为我们班指导写作的辅导老师。由此我知道，他是桐城学派姚鼐的后代。他的大哥是老文艺战士，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1950 年他响应号召，举家到田家庵投身建设。即使在下放山区的岁月里，他仍然笔耕不辍，一些诗词歌赋流淌在心田。汗水伴着墨水，在土地和书桌 上，凝聚着春华秋实。我们一起回忆戏院的往事趣闻，感慨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

红风戏院随着城市发展，文化中心南移，老城区观众流失，已是苏轼的诗句“明日黄花蝶也愁”，难以寻觅过往的热闹非凡。1990 年代，40 多年历史的红风戏院拆迁，原址建设了 7 层住宅楼。戏院用它脚下的土地，为老北头贡献了最后的力量。

戏院已无遗迹可寻，让我不禁唏嘘。我登上了淮河大坝，西边夕阳的晚霞，将一座新建的淮河大桥雏形，映照得如诗如画。戏院的风云变幻已成为过去，淮河儿女在新的赛道上，将演绎出更加美好的时代风采。